

丨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丨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宗教与东亚近代化

Religions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主
编
王
新
生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王新生

宗教与东亚近代化

Religions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东亚近代化/王新生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6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20669-5

I. ①宗… II. ①王… III. ①宗教—影响—近代化—
研究—东亚 IV. ①B928.31②K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4126 号

书 名 宗教与东亚近代化

主 编	王新生
责任编辑	史雪莲
责任编辑	王列丹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 1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669-5
定 价	4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战争与和平观	1
天主教保守政治立场的西方语境	
——以梵二会议精神反思 1945—1949 年的中国教会	28
基督新教教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48
建筑在沙粒上的现代性——近代中国道教转型的艰难	76
近代国家神道探源：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原点	123
“国家神道”的宗教性质及其语言结构特点	
——读岛藺進的《国家神道与日本人》	151
近代日本的新宗教与国家治理	179
地震宗教学——1923 年红卍字会代表团访日赈灾与大本教	201
盟军占领时期的日本宗教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219
韩国佛教的近代性与殖民地性——带妻僧问题与佛教净化运动	242
试论西学对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思想的影响	268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战争与和平观

彭福英^①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政府当局主要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绥靖政策以及“一面交战，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并对共产党实行围剿政策。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也坚持认为打倒国民党政府是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形成具备了条件。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党发表了抗战宣言，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正式确定了坚决抗战的方针，并最终走向了全民抗战的道路。

面对国难，全国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救亡运动。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关注时局。如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刊发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多主张在“最少损失”的前提下能和则和，以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

^② 《独立评论》，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周刊。主要编辑人为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前两年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在其发刊词中提倡：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内以刊登政治时事评论为主，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提倡西方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1936年底因著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同年7月18日终刊，共出244期。

达到最小限度地做出妥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侵华进程的加快,这些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态度,主张当战则战。^①七七事变之后,此刊则赞同武力抗日,争取民族独立,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深切的爱国热情和学术理智下的救国主张。

基督新教知识分子以《真理与生命》^②等杂志为讨论平台,也纷纷发表了对国难问题的看法与思考。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新教教徒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大体来说,其立场可以分为三类:武力抵抗派主张坚决抵抗,武力抵抗;中间调和派一方面不能断定基督徒是否能加入抗敌队伍,另一方面从民族情感上认为应该抗敌;唯爱主义派不管当局大势,反对战争,不赞成抗敌。^③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唯爱主义变为少数派,遭到了其他各派的质疑与挑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武力抵抗派与中间派呈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一致赞同以武力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应当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各阶级、阶层,都拧成

① 有关《独立评论》关于抗日战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参看张太原:《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0—266页;罗福惠、汤黎:《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6—82页;武菁:《〈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第57—63页;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第85—90页;喻春梅、郑大华:《“九一八”之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第71—78页等。

② 《真理与生命》,创办于1919年,初名为《生命季刊》,为北京证道团刊物,仅出一期,第二年改为月刊,由刘廷芳担任主干。1922年,证道团改名为生命社,月刊编辑改为委员制,由吴雷川担任主席。1926年《生命季刊》与《真理周刊》合并,改为《真理与生命》,半月刊。编辑开始采用委员制,后采用总编辑制度,由赵紫宸担任。1930年改为月刊。每年一卷,每卷八期,二七八月停刊。宗旨为:与国内教会先进及学运领袖,在急转的时局中及纷乱的思潮里,谋基督教运动之前进是已。1932年后总编辑为徐宝谦,编辑有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柏基根、梅贻宝、李荣光等。参见徐宝谦:《第七卷卷首语——敬告读者》,《真理与生命》第七卷第一期(1932年10月)。

③ 有关基督教新教教徒对抗日战争的思考和讨论,参见姚西伊:《“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85页。

一股绳,团结对外,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危难。

作为国民的一分子,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也非常关注中国时局的发展。本文以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华创办的刊物为主要考察对象,阐释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考量。

一、息内战,共抗战——“爱国老人”马相伯的抗日主张

马相伯生平 马相伯,天主教著名爱国人士。1840年4月17日出生于丹徒一天主教家庭。1852年,入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①学习,1862年入耶稣会,三年后晋升司铎,在徐家汇堂区担任传教工作。1876年,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参政。^②先后担任了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朝鲜国王顾问等职。1897年重返教会,积极践行“教育救国”理念,创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参与创办“函夏考文苑”、辅仁社和培根女校。后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1925年,参与创办辅仁大学。抗日战争期间,马老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奔走呼号,并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1939年11月4日溘然长逝。

① 依纳爵公学,1850年由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设立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所西式学校,以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之名命名。

② 关于马相伯退出耶稣会的原因,各有其说法。罗马耶稣会档案中记载,一方面是因为马相伯之弟马建勋申请入会遭拒,继而对马相伯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耶稣会的某些行为,如私自拆开私人信件、徐家汇神学院食堂的伙食等,导致了马相伯对耶稣会的不满,参见(李天纲:《耶稣会档案中有关马相伯事迹记录》,《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第67—76页;而黄书光则认为是因为其弟马建中先行离会,教会负责人无故拆检其私人信件,乃至教会中的一个外国厨子所做的饭无法下咽,马相伯陷入极大的心理沮丧,并最终做出离会参政的人生抉择。参见黄书光:《国家之光 人民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侵略战争，实属不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中国不少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清楚的了解，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时冲突而已。马老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指出这一事变绝非一时冲突，日本“乃处心积虑，以谋战我东三省诸领域，兹近三十年，专家设计，秘密进行”^①。日本觊觎中国已久，其发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占中国。战争发生后，日军“不仅强占我土地，甚且对于男女老幼都视同草芥，以屠杀快意，枪射炮轰，不惜随处演出至极残酷之惨剧；此种强暴行为，而表现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吾人称日本为国际大盗无不殆当！”^②1932年，淞沪会战之后，马相伯在《良心救国之大义》中再次沉痛地指出：“日之来犯，不宣而战，按国际公法言，不正当！且其残暴，戮我民众，按人类正义言，实野蛮，乃至炸毁我文化建筑、生产工厂，甚至侮辱妇女加以戕害，捕童子军亦施毒手，种种越出文明正轨之行为！总之，不禁欲亡我国，实则将灭我种！”^③1932年底至1933年初，马相伯应邀就国难问题在电台做了十二次演讲。在第一次演讲《国难的根本问题》中，马相伯对日本的残暴行径已近乎出离愤怒，“因为日本侵略违反人道！要灭我们中华民族的种！按国际公法，人类正义，谁都该表示反抗！……如果在欧美任何一国一地，用飞机来轰炸，实行不宣而战；并奸淫妇女，杀戮俘虏，放毒气炮，用达姆弹等等，那不是要轰动全世界，凡有人气息的都要来仗义执言吗？难道我们同胞‘鸡狗不值？’要杀便杀，岂有此理！”^④……“现在万人，到处掘井，或用火器，或用毒气，要陷害我四万万人。因此老人不得不唤醒同胞，拥护人道，努力图存，拿人道来制裁万人？……我们按照人道主义行事：所谓攻其恶，并非来复仇！那用火器毒气等违反人道的暴行，我们不仅要来抗御，实际上要制裁他也算是尽了人道！”^⑤马老还从造物主的观

① 马相伯：《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02页。

② 马相伯：《泣告青年书》，《马相伯集》，第905页。

③ 马相伯：《良心救国之大义》，《马相伯集》，第941—942页。

④ 马相伯演说，徐景贤记载：《第一次广播演说词：国难的根本问题》，《马相伯集》，第970页。

⑤ 马相伯演说，徐景贤记载：《第四次广播演说：组织“不忍人”会》，《益世报》1932年11月25日。

念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造物之外,人无杀人权;人无取非其有之权;故不得因兵力,而得土地权;亦不得视人民如土地上草芥,而有杀人权。如今日帝国征讨主义者,亦不得视人民如土地上草芥,而有杀人权,如今日帝国征讨主义者且不得因妄念有土地权,便可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而不知保管;亦不得因妄念有杀人权,便可借仇寇之刀,以杀人民也!”^①马相伯沉痛地指出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灭亡中国,即是在谴责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不正当,不是为了自卫和达到和平的目的,而是为了侵略他国;开战之时,没有任何宣战;而在战争中,日军没有节制地使用武力,大规模使用毒气等战争武器,没有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残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甚至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并造成了对工厂等非军事建筑的严重破坏等,种种行径,昭示着日本的侵略野心,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是不正义和不合法的。

平等自由基础上之和平 对当时盲目谈论和平之流,马相伯指出:“实则今之所谓和平,乃奴隶与主人的和平,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和平,因为和平是‘增美’,而欲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先大刀阔斧地与和平之障碍与蠹贼做殊死战,把他们消灭后,我们才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在层层压迫或无耻的投降状态中,谈和平,皆不知‘饰’与‘增’之道者也,皆赧然人面,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也!”^②真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关系之上,和平不会自己来临,也不能依靠国联等组织的努力。“然而自九一八以与今日,历时已八旬有余矣;求助与乞怜之结果,果如何者?……是诚为世之大愚,是徒自取侮辱,自殆伊戚?不求自助而求助于人,欲以此而侥幸立国;此种心理,诚为灭国之象征,成为极可痛心之现象。”^③马相伯认为,那种认为通过国联可以恢复和平的说法只是痴人做梦,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借助于人,而达和平之成果,是不可能办到

① 马相伯:《国难人民自救建议》,《马相伯集》,第914—918页。

② 马相伯:《一日一谈:三论国家问题二》,《马相伯集》,第1158页。

③ 马相伯:《泣告青年书》,《马相伯集》,第906—907页。

的。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将侵略者驱逐出国,才能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和平。

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面对日本入侵,马老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战与不战,而在于如何战。“天助自助者。目前之生路,尚望全国朝野上下,一心一德,立即团结,以国家土地人民为前提,以武安国民众武力为后盾。……废止内战一致对外。坚持到底,不还我河山不止!”^①中国的出路,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依靠国民,立息内战,一致对外,抵抗侵略。

在马相伯看来,和平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之上,若不是,则不是真正的和平。战争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为了自卫与和平目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面对当时国内内战频仍的形势,马老呼吁要立息内战,共御外侮,以赢得和平、独立和自主。

二、在华天主教机关刊物《圣教杂志》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回应

爱德和正义 1931年9月,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月,《圣教杂志》刊出了徐宗泽^②《国家关系当知之原理》一文,指出国与国之间发生关系,基于爱德,友爱第一,互相扶助,彼此尊敬领土领海领空主权,不加侵犯;当发生战争时,战争应当公共,即宣战、停战都需由国家元首来执行;战

① 马相伯:《关于李顿报告书意见》,《马相伯集》,第937—938页。

② 徐宗泽,字润农,教名若瑟,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青浦县之蟠龙。徐宗泽自幼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19岁时曾参加童子试为邑庠生,后入徐汇公学,接受西方教育。1907年,入耶稣会初学院。两年后,前往欧美深造,获哲学博士。1921年回国后,先在南汇县境传教,转而接任潘秋麓,担任《圣教杂志》的主编,直到1939年该杂志被迫停刊;同年,徐宗泽还兼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大力搜寻地方志。在清末民初,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地方志在全国居于首位。徐宗泽在《圣教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神学、哲学及教史之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多达二十余种。主要有:《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1926年撰)、《妇女问题》(1926年编)、《共产主义驳论》(1926年编著)等。此外徐宗泽还负责指导启明女中及徐汇女中等校务,教授教理、公民等课,又任圣母会指导司铎。抗战胜利后,徐宗泽希冀将藏书楼改为现代化图书馆,公诸社会,同时恢复《圣教杂志》,均未获得教会支持。1947年6月20日,因斑疹伤寒逝世。徐宗泽生平可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3),中华书局,1970年影印本,第322—325页。

争应当公义,即战争是为恢复社会伦序,而伦序之侵犯,或因不知,或因恶意;战争当用有效之方法,合义之战,是为全国之利益,是为恢复被侵之权利,故当用种种战具、策略,全力以赴之;战争当有节制,战时不可害仇过度,不可杀害无辜,不可无礼焚毁,待遇俘虏,当有人道。^① 徐宗泽基于天主教的爱德观念,强调了国家关系之间所应该追寻的仁爱原则。作为天主教的机关报之一,应该说徐公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在华天主教官方的观点,即在 30 年代初,在对待中日问题上,寄希望于国际关系中各国当遵守的原则,彼此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但对待战争,沿袭了天主教“正义战争”传统,强调了战争的“当公共者”“当公义”“当用有效之方法”等特征。《国家关系当知之原理》一文,强调了仁爱观念,但同时没有忽略正义的理念。这种态度,与马相伯坚决主张武力抗日有异,但在天主教“正义战争”理念的基础上,为武力抗日开拓了空间。

正义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日全面战争展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徐宗泽撰写了《天主上智亭毒中之战争》,文中指出战争是一种变态的社会现象,“为扰乱社会和平,人类伦序之大祸患,故当极端以避免之”^②。战争既不是天主所造,也不是天主所欲的,天主本来可以阻止战争,但天主许如人以自主权,而人又有私欲,故而战争会发生。但战争是在“天主上智预见预许之中”^③。战争分为“无理觉情冲动”和“合理尽义”之战,即不义之战和正义之战。自卫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国家有天赋之自卫的权利,就好像个人有自卫的权利一样。个人生活的权利,不容他人侵犯,国家也是这样,有存立于世之独立主权。如果这种主权被别国侵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战争一种途径,那么,战争就成为这一国元首应尽的义务和本分,也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对于“自卫之战,天主教不特不反对之,且是为正经之战争。……自卫之

① 徐宗泽:《国家关系当知之原理》,《圣教杂志》1931 年第 9 期,第 514—525 页。

② 徐宗泽:《天主上智亭毒中之战争》,《圣教杂志》1937 年第 12 期,第 706 页。

③ 同上,第 707 页。

战,即正当敌人以暴力侵犯我领土,蹂躏我主权时,为保存国运,起而抗战,此等战争,是有光荣者”^①。徐氏举 1914 年比利时国土受德国军队蹂躏之时,比利时国民起而抵抗的光荣历史以及当时天主教神父梅西耶(Cardinal Mercier)爱国事迹。“合理尽义”之战即是保护被侵之权利,维护人类正常秩序的战争。这种自卫的战争,至最后关头而不得不“应战”“抗战”,战争已成为紧要,而为光荣之一^②,……因而公义之战,在抑止仇敌无理之举动;是保护正当权利最后之方法。战争虽然至为悲惨,但惟有至大之战务在,始可受至惨之痛苦;战争之正当,不在于战胜之利益,而在于公义之平安,即用战争以恢复社会之秩序,而永久保存之;战之灾祸,乃今世之一种罪罚,天主许以严惩人民,及清洁人民之罪恶者也。“战争固未尝不可,惟当要有其最大最正之理由,且又是为保护公义不能幸免者也,既开战矣,交战治国,能用种种合理的有效方法,制服敌人,使公义得以恢复,和平得以复还也。吾谓合理的有效方法,因为战争所用之方法,亦当依性律之许可,及战时国际方法之所规定,非任何非法之战具,违禁之动作可以任意施用也。”^③

徐宗泽在此也阐释了天主教正义战争的一些原创,如战争是为了保护公义和正当权利,且是唯一的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平和秩序;正义战争需要宣战,要恰当地使用武力,遵循国际方法,不能滥施武力和武器。1938 年第 1 期《圣教杂志》发表了徐宗泽的《战争论》、第 2 期刊登的上海教区甘雅各的《天主教与战争》,这两篇文章都追溯历史上天主教对待战争的态度,为教友支持战争,保卫祖国寻求到了教义上的支持。随着战争的深入,抗日热潮的高涨,以前那种强调仁爱的态度和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待民族救亡的武力抵抗,秉持了积极的肯定的回应。

① 徐宗泽:《战争论》,《圣教杂志》1938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② 徐宗泽:《天主上智亭毒中之战争》,第 708 页。

③ 徐宗泽:《战争与爱国》,《圣教杂志》1937 年第 11 期,第 642—646 页。

三、九一八事变之后《益世报》的抗日言论和主张

《益世报》《益世报》是民国时期天主教会在华刊发的中文日报,由时任天津教区副主教的比利时人雷鸣远^①(Frederic Vincent Lebbe, 1877—1940)于1915年10月邀请华籍教徒刘守荣^②与杜竹宣^③在天津创刊,报馆设于荣业大街,1915年10月10日出第一版,初期每份13—14页(3—3.5张),零售每份4分,全年11元,发行量多达25000—30000份,是中国近代颇具声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之一,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民国时期“四大报”。《益世报》虽为公教背景,但并非传教性报纸,而是一种内容宏富、颇具自身风格与特点的公共性报纸。它全方位而又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情况,举凡政坛动向、军事活动、司法审判、宗教信仰、交通运输、市政设施、民风民俗、社会情状、租界记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涉及与反映,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以及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提供了大量足资参证的重要历史资料。^④创办者雷鸣远积极提倡爱国主义和倡导天主教本地化运动。在1917年天津老西开事件中,支持天津市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也刊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20世纪20年代初,《益世报》蓬勃发展,直系在津期间,刘守荣还担任了天津电报局局长。后奉系占据,刘守

① 有关雷鸣远生平,参见方豪:《雷故司铎雷鸣远事略》,[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民国间[1912—1949];杨爱芹:《〈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其人其事》,《纵横》2009年第7期,第42—45页等。

② 刘守荣(1880—1934),字浚卿,天津蓟县人,曾任天津教会所办的诚正小学与贞淑女小的校长,共和法律传习所所长,公教进行会会长。《益世报》创刊之时,出任总经理,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除却1925年到1928年奉系强占报纸的三年之外,一直担此重任,直到1934年去世。

③ 杜竹宣(1883—?),山东人,华北协和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任天津《大公报》编辑,与雷鸣远创办《益世报》,1917年在北京创办北京《益世报》。

④ 徐宗泽:《战争与爱国》,《圣教杂志》1937年第11期,第642—646页。

荣被捕,《益世报》编辑部也被控制。奉系退出以后,《益世报》入不敷出,每况愈下。后刘守荣励精图治,邀请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出任总编辑。《益世报》作为分股经营的报馆,设社长一名、经理一名(1930年张凤秋)、总编辑一名。编辑方面,则设总编一人,下设社论股、编辑股、各地采访股等。社论股直接对总编辑负责,主笔一般由学术文化界卓有声誉的人士担任。刘豁轩出任总编辑后,邀请罗隆基^①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并允诺其在不危及报纸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薪金定位伍佰元。^② 罗隆基担任主笔期间,社论题名一概由罗氏定夺,内容全由他一人写就,文章写好,笔误错字可以纠正,其他概不可改易;报馆设专室,供读书看报写稿,他人不得打扰,社论写文就走,何时来报馆,何时离开,他人无权过问。《益世报》的董事长雷鸣远自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战。1932年11月11日,马相伯先生倡导成立不忍人会,募集捐款,支持抗日战争。雷氏积极捐款之外,还于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中,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罗隆基曾一度担心他的文章给报馆带来麻烦,雷鸣远表示:“你放心,你放心。请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呢。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

① 罗隆基,字努生,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896年出生于江西安福县,幼年喜读古典诗词。1913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学习,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的仰慕,1926年转而赴英求学,就读于伦敦经济政治科学学院,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归国,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并担任《新月》杂志的主编。后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于1930年被捕,获释后,在光华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报告了被捕经过,接着发表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新月》1930年12月出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职。在刘豁轩的邀请下,罗隆基前往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同时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次年被剥夺一切职务。1965年12月去世,终年69岁。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

② 罗隆基:《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的风风雨雨》,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办报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我们报馆的。”^①社论最能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经理和董事长的支持也表明,罗隆基撰写的一系列社论,支持抗日救国,其立场和报馆的立场是一致的,能够代表当时《益世报》对抗战问题的探讨和思考。罗氏撰写的论文,文笔犀利,一针见血,引起了国民党的厌恶和憎恨,多次出面要求《益世报》更换主笔,遭到了经理刘豁轩的拒绝后,于1933年秋天试图暗杀罗隆基,未遂。出于对罗隆基个人安全的考虑,《益世报》辞退了罗隆基。不久聘请清华大学钱端升任社论主笔。钱端升文笔也相当犀利,丝毫不逊于罗隆基,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并被迫休刊三个月。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益世报》抓住时机,再此聘任罗隆基担任社论主笔,全面抗战之后,《益世报》被迫停刊。

应战而不求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益世报》发表社论,认为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频频挑起事端,制造借口。中日两国之间,绝非某种事件之交涉,而是整个政治问题。^②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应该坚决抵抗,武力抵抗。“中日的冲突,我们看他是物竞天择的冲突。……物竞天择的冲突,是弱者的自作孽,是弱者该被淘汰。……此刻,敌人不顾及中国的不能战,不能战是敌人的机会。能战,敌人或不来侵略;不能战,敌人非来不可。谁又看见羊的恭驯、妥、屈辱求和,得到了狼的体恤原谅?意志可以征服环境。明知其不能,我们有必做的志愿,则不能亦可使之能。”^③七七事变之后,《益世报》发表了《为中日问题告日本国民》一文,驳斥了日本“排华”“华北自主与共同防共”等策略,揭露并猛烈抨击了日本侵华政策,号召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为了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到底。“今日已到了和战的歧途,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还要继续侵略,

① 罗隆基:《雷鸣远与〈益世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租界谈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② 《如何应付日本之勤路》,《益世报》1931年9月19日。

③ 《不能战与不愿战》,《益世报》1933年4月18日。

那么结果当然只有战。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也爱正义,更不能不顾到自己的生存。我们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我们也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①7月25日,《应战而不求战——全国一致的态度》一文中,认为现在中国对日容忍的止境,到了最后关头,绝不惜牺牲和平,这是我国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转变。应战而不求战,丝毫不违背我国爱护和平的精神,应战也是政府抗敌御侮的重要职责,而在国民亦不失为求民族生存的最高度努力。^②《益世报》敏锐地考察到日本的野心和事件的本质,旗帜鲜明地主张武力抵抗,铿锵有力地呼吁收复失地。在抗日卫国,抵御外侮中举起了爱国主义的大旗。

“内战”和“外战” 七七事变之前,《益世报》不断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对外采取消极抵抗,对内实行剿共政策。《武力抗日与政治清共》指出武力解决不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应该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抗日一定要坚持武力抵抗。^③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是内战,而与日本的战争是对外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内战要让位于外战。

总之,九一八事变之后,《益世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武力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外交上反对零碎外交,局部调停,时效性强,逻辑缜密,言辞锋利,饱含爱国热情,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扩大了《益世报》的影响。作为天主教背景的报刊,《益世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也反映了天主教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难,满怀爱国主义情绪,主张武力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决心和勇气。

四、天主教知识分子为抗战寻求的理论支持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主张武力抵抗,并积极为此主

①《为中日问题告日本国民》,《益世报》1937年7月23日。

②王赣愚:《应战而不求战——全国一致的态度》,《益世报》1937年7月25日。

③《政府应对日实行经济战》,《益世报》1933年4月28日。

张,寻求天主教传统“正义战争”理论的支持。

(一)“正义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基督教历来分为两派:即和平主义派和正义战争派。和平主义派基于基督教有关不能伤人性命的教义,旨在促进和平,谴责使用暴力,这种观点在公元4世纪之前是基督教的主流观点。^①其最大特点就是主张非暴力,谴责任何有可能危害身体或致命的暴力行为。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 272—337)发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宣布罗马帝国境内人民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跻身为罗马帝国内一支有着重要影响的力量之后,正义战争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和平主义派的呼声一直存在,如公元410年罗马遭到攻陷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主张非暴力;10—13世纪的上帝和平运动(Peace and Truce of God),圣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 c. 1092—1156),罗杰·培根等对十字军东征的讨伐;方济各会等修会效仿耶稣的生活等等。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新教派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但他们坚持了和平主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死伤更加使人们怀疑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有效性,和平主义力量在欧洲得到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和平组织,如国际和平组织(1891)、国际反战联盟(1921)、和平保证联盟(1934)开始成立。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正义战争理论在基督教内一直是主流思想。

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正义战争”这个词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亚氏强调了战争的目的,即“立法家对于他所

^① 参看 David L. Clough, *Faith and Force, a Christian Debate about War*,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0.